

多学科介入下的 修辞分析

张虹倩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多学科介入下的修辞分析

张虹倩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学科介入下的修辞分析/张虹倩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86-1225-4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修辞学—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4298 号

多学科介入下的修辞分析



著 者——张虹倩
责任编辑——吴耀根
特约编辑——盛晓玲
封面设计——严克勤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o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00 1/16
印 张——8.75
字 数——17 万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1225-4/H·94
定 价——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胡范铸

《多学科介入下的修辞分析》似乎不“像”一本“修辞分析”，不过，我觉得却应该说真“是”一本“修辞分析”。

历来的修辞分析通常都是基于某一个理论而展开，比如传统修辞学所做的基于修辞格的分析，基于同义结构的分析，基于语体的分析；再比如新近修辞学所做的基于修辞构式的分析，基于修辞结构的分析，基于语篇的分析，等等。

本书却相当不同。由“对多学科介入的必要和可能”的思考开始，分别从文献学出发考辨字词，从语法学出发辨析句法，从互文性理论出发探究语篇，从社会学出发思考国家与机构话语，原本似乎互不关联的学科却被组织在一起，用作修辞分析的理论工具，既别具一格，也难免让人产生某种困惑。

不过，如果换一种视角，也许可以说，这才是一本真正可能显示修辞分析应有格局的著作。

什么是修辞？我以为，修辞并不等于语言的“修饰”，乃至某些学者所说的语言的“装潢”。语言既是一个符号体系，更是一种行为过程。“修辞在本质上就是人类运用语言、文字以实现自己意图的行为过程”。人是语言的动物，言语行为是人类基本的行为之一。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都离不开言语行为。

就此而言，修辞研究的根本目标不应该停留在语言结构的理解，而在于如何借助修辞分析有效地推动我们对言语行为的理解，并进而推动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任何研究范式都应该是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依据这一目标，则“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国家与国家如何对话，机构与机构如何对话，国家和机构如何与社会公众对话”便不能不成为修辞分析的中心话题；任何言语行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言语行为乃至全部语境条件的连接中呈现的，则互文性分析不能不成为修辞分析的基本原则；“修辞研究的根本目标不应该

停留在语言结构的理解”，但也不能舍弃语言结构的理解，言语行为有不同的层面，一篇短文可以是一个言语行为，一套丛书也可以视作一个言语行为，不过言语行为的最小的可分析单位主要还是体现在句子层面，则充分运用语法学资源对句子的结构与使用做出充分有效的辨析，便不能不成为修辞分析的着力点；“意义即用法”，对一个言语行为语义语用的有效把握离不开对语言结构的初始用法、经典用法、常规用法、高频用法的全面理解，则借助于文献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对字词加以考辨，便同样不能不成为修辞分析的一种基础。

当然，试图将文献学、语法学、互文性分析乃至社会学理论融会贯通，形成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在初始阶段自然也就难免有简单生涩之处。不过，这种体例上的某种生涩和衔接上的某种粗糙都遮蔽不了一种令人欣喜的理论可能。

《多学科介入下的修辞分析》的体例是新鲜的，而它的作者更是年轻的。张虹倩博士今年才28岁，可是她博士后出站都已两年，目前已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晨晖学者”。她硕博连读，攻读的是复旦大学文献学方向，博士后则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应用语言学方向，博士后出站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师，同时教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三门不同学科分支的课程，并深得学生好评；先后主持不同研究方向的国家和省部级社科项目多项，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章太炎语源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始〉为核心的考察》、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传统互文理论研究——兼论中西互文的对话》、上海哲社项目《语言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叙事》，并先后在日本的《中国语学研究·开篇》、澳门的《澳门语言学刊》和中国大陆的《当代修辞学》、《外国语》、《中国文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显示了相当广博的学术兴趣和难得的学术素养。

可以说，《多学科介入下的修辞分析》与其说是一本修辞分析的“专著”，倒不如更应该把它看作为一本新格局的修辞学探索大书的“引言”；与其说是一位青年学者的“成果”，倒不如更应该说是她的更为广阔的学术未来的理论“准备”。“根深”才能“叶茂”，“体大”成就“思精”。

“晨晖”初发既已如此斑斓多彩，旭日东升当更具气象万千。

我期待。

（胡范铸，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原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

目 录

绪论 修辞分析：多学科介入的必要和可能	1
第一章 字词考辨：修辞分析的文献学基础	4
第一节 基于词汇史的考察：以“笑”“作客”“做客”为例	4
一 “笑”字源流辨析	4
二 “作客”“做客”源流辨析	12
第二节 基于社会文化史的考察：以“汉寿亭侯”为例	18
一 “寿亭侯”现象探析	18
二 “汉寿亭侯”命名探析	26
第三节 基于语源学史的考察：以《文始》为例	35
一 《文始》之于章太炎学术体系价值的重新认识	35
二 《文始》之于中国语源学发展价值的重新认识	39
本章小结	45
第二章 句法辨析：修辞分析的语法学资源	47
第一节 基于语法化的考察：以“教”为例	47
一 “教”的语法化探究(上)	47
二 “教”的语法化探究(下)	51
第二节 基于句式的考察：以“除非”为例	56
一 语言学史上的“除非”之争	56
二 “除非”句句式历时演变研究	61
本章小结	69

第三章 语篇探究：修辞分析的互文性视角	70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的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	
——以副文本目录为核心的考察	70
一 副文性理论提供的语言学视角	70
二 从副文本目录变迁看 20 世纪现当代文学史修辞构筑的嬗变历程	71
三 20 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修辞策略	75
四 构筑另一种文学史的可能	79
第二节 现代汉语修辞学名著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以《修辞学发凡》引文性结构为核心的考察	80
一 关于《修辞学发凡》版本的选取	81
二 《修辞学发凡》之现代白话语例探析	81
第三节 现代汉语语法学名著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以早期语法著作中引文性结构为核心的考察	93
一 早期语法著作中现代白话语例探析	94
二 现代汉语制度化构筑参数	99
第四节 西方互文性理论的中国渊源	
——以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为核心的考察	102
一 《中国妇女》文献出处考	103
二 《中国妇女》引文考	104
三 《中国妇女》译文考	105
四 《中国妇女》史实考	108
五 余论	110
本章小结	113
第四章 机构话语传播：修辞分析的社会学价值	114
第一节 全球视野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114
一 全球传播与国家形象修辞	115

二 全球汉语教育与国家形象修辞	116
三 语言政策与社会发展	117
四 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与社会生活	118
第二节 新媒体条件下“政治传播修辞案例库”研究的必要与可能	120
本章小结	122
参考文献	123
后记	130

绪论 修辞分析：多学科介入的必要和可能

人的发展离不开对“我是谁”的思考，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本学科是什么”的追问。

则，何谓“修辞”？

中国修辞学界或以为这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化”的过程，或以为是一种“调整文辞以适应题旨情景”的过程，或以为是“词汇与句法的使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也出现了各种研究路径，或执着于“修辞格”，或聚焦于“语体”，或集中于“修辞构式”……

而根据胡范铸先生的“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既是一种符号体系，更是一种行为过程，一切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过程都是修辞过程”（胡范铸，2015）。进而言之，所谓“修辞”，即是“提高言语行为有效性的活动，任何理性的言语行为无不同时关注行为的有效性，则一切理性的言语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修辞行为”（胡范铸，2016）。

任何有效的学术研究范式都是“目标”、“问题”、“方法”三者的统一。目标产生问题，问题选择方法。由对修辞的重新定义出发，“修辞学的根本目标”便是“以对话语行为的分析入手，有效地推进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修辞学的基本问题也不再局限于“修辞语辞”、“美化语言”，而是设定为“当代生活中，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人与机构的语言交往如何现代化？”（如：怎样遵循恰当的语用准则以有效应对“钓鱼岛事件”之类的突发危机？网络时代如何将网民的“人口优势”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民意优势”？如何造就国际“意见领袖”？如何克服跨文化传播听者预设中的“文化猎奇者假设”？等等。）无疑，这是一种全新的修辞学认识。

不过，这固然是一种“新修辞学”，我们以为，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对于传统修辞理论、方法和问题的“抛弃”，相反，应该是一种更广泛、更周密的理论“包容”。因为，既然“修辞就本质而言就是一种语言运用的过程”，那么，在实际运用中就需要调动语言文字上的一切可能性；同时，在修辞研究中，也就需要借助于语言学内外各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围绕具体言语行为加以思考和分析。

鉴此，本书将以“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为基础，依次由字词、句式、语篇以及机构话语等多层次、多角度切入，试图把“新”“旧”问题汇聚一起，“传统学术”与“现代

方法”彼此打通,勾勒一个相对宽阔的学术图景。

具体而言,本书的体例分布如下:

除“绪论”外,设立四章。

第一章 字词考辨:修辞分析的训诂学基础

作为一种语言运用的过程,修辞离不开对字词意义理解的正确把握。这就提示我们借助文字学、训诂学等理论方法对“笑”“作客”“做客”等系列字词意义演变的源与流加以探讨;而字词的意义通常是在一定社会文化框架下产生并得以不断演变,并结合社会文化史加以考察(以“汉寿亭侯”为例);最后由微观转入宏观,基于语源学史角度对整个词义系统演变作更进一步地探究(以章太炎《文始》为例)。只是,对于“修辞分析”而言,这里只是提出一种理念,而非有效的具体分析,至多只能算是“前奏”。

第二章 句法辨析:修辞分析的语法学资源

修辞离不开对句法、语义的合理分析,这就提示我们借助语法学的理论方法展开细致考察:以“教”字句为例,探讨“教”的语法化轨迹和演变规律;以“除非”句为例,探讨语言学史上就其意义、用法等的论争及其句式的历时演变。

第三章 语篇探究:修辞分析的互文性视角

修辞离不开对语篇结构的切实把握,而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又是当前篇章语言学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这就提示我们借助互文性理论所提供的语言学视角对中西方文学展开一系列新的考察:基于副文本目录探究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修辞学发凡》现代白话语例(引文性结构)探究修辞学家陈望道笔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于早期语法著作中现代白话语例探究早期语法学家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于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中译本)所征引的大量中国古代文献考察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元素”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 机构话语传播:修辞分析的社会学价值

国家和机构形象本身也属于一种社会行为。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越是民主化,世界越是一体化,国家、政府机构、企业学校、社会团体越是需要学会有效“对话”。由此,“国家形象的修辞”和“机构形象的修辞”的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何运用语言手段对国家和机构形象加以维护?如何确立机构与个人、机构与机构彼此间的有效对话?这便成了中国当代修辞学转向的一个重要标记。

21世纪初,胡范铸提出了“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的设想^①,并连续举办了六

^① 同时指出国家形象修辞在本质上是机构形象修辞的一种特殊类型,国家形象修辞研究的逻辑发展应该是机构形象修辞学。

届“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学术研讨会”。国家与机构话语的修辞研究不但意味着中国修辞学研究者社会使命的高度自觉,同时也应该意味着修辞学研究技术与工具性范畴的大幅创新。由此提示我们采取案例库修辞学、实验修辞学等系列理论方法展开考察,以揭示国家和机构修辞背后的社会学价值。对于中国修辞学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更是一个必须大力拓展的领域。为此,本书不但阐述了研究的具体设想,同时也对国内近几年来主要成果和最新动态作了扼要的介绍与评论,以期能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应该说,本书还远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新的理论体系,只是依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框架,由语言学的多学科维度切入,对真正的“修辞学研究”的一种“接近”。因此,其中不少章节与其说是“修辞分析”,不如说还只是“修辞分析”的理论准备。这一准备,一方面也许可以对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篇章语言学等学科的一系列有关问题予以回应,另一方面或许可以提示在拓展传统修辞学研究领域时,更多地借鉴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可能性。

如何将传统语文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现代语言学的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乃至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美学、伦理学等等真正熔铸一炉,冶炼出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饱满的知识含量、确切的应用价值的新修辞学,还寄望于学界先进与青年同人。

第一章 字词考辨：修辞分析的文献学基础

既然“修辞”本质上是人类运用语言、文字以实现自己意图的行为过程，那么，它便离不开对字词意义理解的正确把握。

这就提示我们首先需要借助文字学、训诂学等理论方法对字词意义演变的源与流加以细致探讨；而鉴于字词的意义通常是在一定社会文化框架下发生并发展的，故结合社会文化史加以考察同样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高立于语源学史的视角，以期从整体上探究汉语词汇系统的古今发展大势。

当然，上文已述，这里只是提出一种“修辞分析”的理念，而非从事有效的具体分析。

第一节 基于词汇史的考察：以“笑” “作客”“做客”为例

一 “笑”字源流辨析

（一）“笑”是《说文》原有还是徐铉妄加？

大徐本《说文解字·卷五上》（清同治十二年陈昌治刻本）：“笑，此字本阙。”可见在徐铉所见的《说文解字》版本中，并无“笑”字。关于徐铉是据何补入此字，桂馥和朱骏声持有不同观点。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十三》（清同治刻本）：“笑，徐铉据李阳冰本加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部第七》（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啸笑，此字本阙，徐铉据《唐韵》补入，《说文》‘笑，喜也，从竹从犬’，今俗皆从犬。”桂馥认为徐铉是据李阳冰勘定的《说文》而补入此字，而朱骏声则认为徐铉是据《唐韵》而补入此字。据陈昌治刻本，徐铉的原注为：

臣铉等案：“孙愐《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义。今俗皆从犬。”又案：“李阳冰刊定《说文》‘从竹从夭，义云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审，私妙切。”

由此可见，桂馥和朱骏声都失于偏颇，徐铉应当是根据孙愐的《唐韵》以及李阳冰刊定的《说文》方补入“笑”字。

据徐铉《说文解字·进说文表》：

左文一十九《说文》阙载，注义及序例偏旁有之，今并录于诸部：“诏、志、件、借、魑、綦、剔、鬻、醢、赳、顛、璵、櫛、致、笑、迺、睨、峯。”

由此可知，大徐本《说文》中增补了《说文》阙载的十九字，而“笑”则为其中之一。王力(2006)指出徐铉的补字标准有三：其一为“许慎自己的注解中本来就有某字，而字条中却没有此字”；其二为“《说文》中虽无此字，但经典相承有此字”；其三为“虽不见于经典”但属于“当代常用的字”。可见徐铉补上“笑”字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据此，可以断定大徐本中的“笑”在李阳冰勘定的《说文》和孙愐所看到的《说文》版本中是存在的，但是在徐铉当时校刊《说文》所用的底本中已经缺失，所以“笑”是《说文》原有，只是大徐当时看到的《说文》版本没有此字而据其他文献补入。

虽然徐铉据孙愐《唐韵》所引《说文》而补入“笑”字可为定论，但《唐韵》的引文究竟为何，不同版本的《唐韵》存在重大差别。据清代纪容舒所著《唐韵考》卷四《去声·三十五笑》(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0242册)：

笑，私妙切三，鞞肖。按笑字《说文》云“喜也，从竹从大”。

值得注意的是，《唐韵考》中的“笑”是“从竹从大”，而大徐本中则是“从竹从犬”，在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清道光年间祁雋藻刻本)中却是“从竹从夭”：

笑，此字本阙。臣铉等案：“孙愐《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夭’，而不述其义。今俗皆从犬。”

(二) “笑”字源流概说

“笑”最初的形体结构如何？围绕着“笑”的源流演变，前贤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会意说

1) “从竹从大”说

持此观点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清代的纪容舒之外，还有清代的席世昌和朱骏声。席世昌《席氏读说文记·说文解字第五》(清嘉庆刻借月山房汇钞本)：“笑，此字本阙。《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大’。”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部第七》：“笑，此字本阙，徐铉据《唐韵》补入，《说文》‘笑，喜也，从竹从大’，今俗皆从犬。”

2) “从竹从犬”说

持此观点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大徐本《说文解字·卷五上》以外，还有唐代张参《五经文字·卷中国子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0224册)：“笑，喜也，从竹从犬。”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五篇上》(清嘉庆二十年经韵楼刻本)：

笑，喜也。从竹从犬。……《玉篇·竹部》亦作“笑”。《广韵》因《唐韵》之旧亦作“笑”。……考孙愐《唐韵·序》云：仍篆隶石经勒存正体，幸不讥烦，盖《唐韵》每字皆勒《说文》篆体。此字之从竹犬，孙亲见其然，是以唐人无不从犬作者。

段注此处有多处值得商榷。首先“此字之从竹犬，孙亲见其然”无从考证，此外“是以唐人无不从犬作者”，也不合于实情。唐人著作中写作“笑”的比比皆是。例如：

蜩与鸂鶒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卷一》，古逸丛书景宋本）

后有萧山郭凝素者，闻王轩之遇，每适于浣溪，日夕长吟，屡题诗于其石，寂尔无人，乃郁快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者莫不嗤笑。（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而至于为何“笑”是从竹从犬呢？连持此说的段玉裁也说不清个中原委：

或问曰：“从犬可得其说乎？”曰：“从竹之义，且不敢妄言，况从犬乎！闻疑载疑可也。假云必不宜从犬，则哭又何以从犬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五篇上》）

3) “从竹从夭”说

小徐《说文解字系传》（清道光年间祁隽藻刻本）虽然引述其兄观点，但大徐本是“臣铉等案：孙愐《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犬’”，但小徐引文却是“臣铉等案：孙愐《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夭’”。此外四部丛刊景述古堂景宋钞本《说文解字系传》和清同治小学汇函本《说文解字系传》也均写作“从竹从夭”。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五篇上》中指出杨承庆《字统异说》也持“从竹从夭”说：

……《玉篇·竹部》亦作“笑”。《广韵》因《唐韵》之旧亦作“笑”。此本无可疑者。自唐玄度《九经字样》始先“笑”后“笑”，引杨承庆《字统异说》云“从竹从夭。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字统》每与《说文》乖异，见玄应书，盖杨氏求从犬之故不得，是用改夭形声。唐氏从之。李阳冰遂云“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自后徐楚金缺此篆，鼎臣竟改《说文》“笑”作“笑”，而《集韵》、《类篇》乃有“笑”，无“笑”，宋以后经籍无“笑”字矣。

段氏在此分析了“笑”由“从竹从犬”变为“从竹从夭”的原因及过程。“笑”从竹从犬“此本无可疑者”。但自从唐玄度《九经字样》转引并接纳杨承庆《字统异

说》之“从竹从夭”说,“笑”逐渐被接受并流传开去,而“笑”则在后世的经籍中渐趋消亡。

考唐代玄度《九经字样》(擒藻唐四库全书荟要第078册),发现书中收录“笑”与“笑”二字,且“笑”位居在前:

笑笑,喜也。上案《字统》注曰从竹从夭,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下经典相承,字义本非从犬,笑、宾、莫、盖、芋、靡、鼎、隸等八字,旧字样已出,注解不同,此乃重见。

至于为何从竹从夭,杨氏并无详述,而段氏推测:“《字统》每与《说文》乖异,见玄应书,盖杨氏求从犬之故不得,是用改夭形声。”可见,段认为杨氏的“从竹从夭”说是立不住脚的。

又,参照大徐本《说文解字·卷五上》“笑”的注解,徐铉云从竹从夭“未知其审”,可知他也不认同李阳冰“从竹从夭”的观点,虽然他所引述的孙愐《唐韵》亦是“不述其义”,但是他更倾向于认同孙氏的《说文》引文。大徐对李阳冰师心自用,曲解许慎原意,一向颇有微词:

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贱目也。((《说文解字·卷一五下》))

其弟徐锴亦云:

说文之学久矣,其说有不可得而详者,通识君子所宜详而论之,楚夏殊音,方俗异语,六音之内,形声居多,其会意之字,学者不了,鄙近传写,多妄加声字,笃论之士,所宜隐括,而李阳冰随而讥之,以为已力,不亦诬乎?((《说文解字系传·祛妄卷三十六》))

由上述论述可知,“笑”字由“从竹从犬”变为“从竹从夭”,虽然持“从犬”说的段玉裁无法给出“从犬”的解释,但“笑”字早于“笑”字是无疑的。

2. 形声说

1) “从竹从夭声”“从竹从犬,犬声”“从艸从犬,艸声”

关于《字林》中对“笑”字的分析,不同文献的引文中有重大差异。主要有“从竹,从夭声”、“从竹从犬声”和“从竹从犬,犬声”三种说法。

“从竹从夭声”说见于清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十三》:

《一切经音义二》云《字林》“笑,喜也。字从竹从夭声,竹为乐器,君子乐然

后笑也”。

“从竹从犬，犬声”说见于清代钮树玉《说文新附考·说文续考卷一》（清嘉庆六年非石居刻本）：

《一切经音义》引《字林》云“笑，喜也，字从竹从犬，犬声。竹为乐器”云云，意说也。

清代任大椿《字林考逸》（清光绪十六年江苏书局刻本）卷三对《字林》的引文也与钮树玉一致：

笑，喜也，字从竹从犬，犬声。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也。

虽然桂馥、钮树玉和任大椿引用的是《字林》中同一处引文（钮树玉是反对《字林》的观点的），但桂馥所引为“从竹，从夭声”，而钮树玉和任大椿所引为“从竹从犬，犬声”，究竟孰是孰非？

原来唐代释玄应《大唐众经音义》（通称《一切经音义》）（清海山仙馆丛书本）中出现两处《字林》引文，但分别是“从竹从夭声”和“从竹从犬声”。其卷三为：

笑，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从竹从夭声，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也。

卷二十四该处引文却为：

笑视，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从竹从犬声，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

不仅唐代释玄应《大唐众经音义》中出现的《字林》引文不一，而唐代释慧琳《正续一切经音义》（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享三年狮谷莲社刻本）所引的《字林》引文也不一，该书卷二十六曰：

笑，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从竹夭声。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也。

但该书卷七十又写成：

笑视，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从竹筴，犬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

《字林》引文纷繁错杂，互相乖异。据此我们推断：

其一，《字林》可能是将“笑”和“笑”作为两个异体字来处理；

其二，“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也”是对“笑”从竹的解释，与“犬”和“夭”是形符或声符无关。

其三，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第二处引文“字从竹筴，犬为乐器”是明显的讹

误。首先,“犬”非乐器,其次,“𠂔”当为衍字。

除了“从竹从夭声”说和“从竹从犬,犬声”说之外,今人还提出第三种观点即“从艸从犬,艸声”说。据刘钊(1999)的考察,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都有“笑”字,结构都作“从艸从犬”。徐力《狗怎么“笑”》(2006)一文也持此观点。他指出在近年出土的楚简文字中,“笑”写成,他认为这三个“笑”字“都是上艸(草)下犬”,且认为“笑字本以艸、犬构成,艸为声符”。

然而无论是从竹从犬之笑、从竹从夭之笑和从艸从犬之笑均未见于甲骨文中。孙海波《甲骨文编》、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及其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和《金文诂林补》等著作中均未收录。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笑”很可能还有更早的字形。

2) “从犬,竹省声”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卷五篇上“笑”》提出一个假设:“笑或本在犬部,而从竹部之字之省声,未可知也。”该假说有其渊源。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卷二篇上“哭”》指出:“窃谓从犬之字,如狡、狻、狂、默、猝、猥、𤝵、狠、犷、𤝵、状、獯、狎、狙、犯、猜、猛、狻、狻、戾、独、狩、臭、弊、猷、类、犹卅字,皆从犬,而移以言人。”可见,段一贯主张“从犬”之字多可“移以言人”,故他提出“笑”并非从“竹”,而是“从犬”,“竹”为某字省声,具体是什么字的省声呢?段在此采取了“闻疑载疑可也”的严谨态度,并未妄下臆断。

3) “从犬,籀省声”

朱骏声与段玉裁都主张“笑,从犬,竹省声”。不同的是,段仅仅是假设,而朱则具体指出“笑,从犬籀省声”。

他在《说文通训定声·小部第七》中指出“此字古皆从犬,本义犬狎人声也,从犬籀省声。【转注】为人喜声,如状为犬形,而言人兒。臭为犬鼻,而言人闻。类为犬种,而言人属。𤝵为犬仆,而言人毙”,认为这些“皆引申之义,习用既久”。关于为何是“籀省声”,他并无令人信服的证据。

3. 形声兼会意说

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卷五上》提出:

筠案:“从夭,夭亦声。夭者屈也。笑时肩背低昂之状也。”

王筠认为“笑”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从竹从夭,夭声且“夭者屈也。笑时肩背低昂之状也”,认为“夭”是人笑的时候“肩背低昂”的样子。王筠的观点实质上也是“从竹从夭”说,只不过他认为“夭”既为声又表意而已,但前文已述,“笑”字“从犬”早于“从夭”,“从夭”说是不对的。